

蒙元龙袍的类型及地位

赵 丰(中国丝绸博物馆 研究员)

龙袍一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但目前对龙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明清两代,只有黄能馥先生写过《龙袍探源》一文,讨论过早期龙袍的起源问题^[1]。笔者也曾经对辽代的龙袍以及龙袍的类型作过局部研究^[2]。除此之外,明代以前的龙袍基本是个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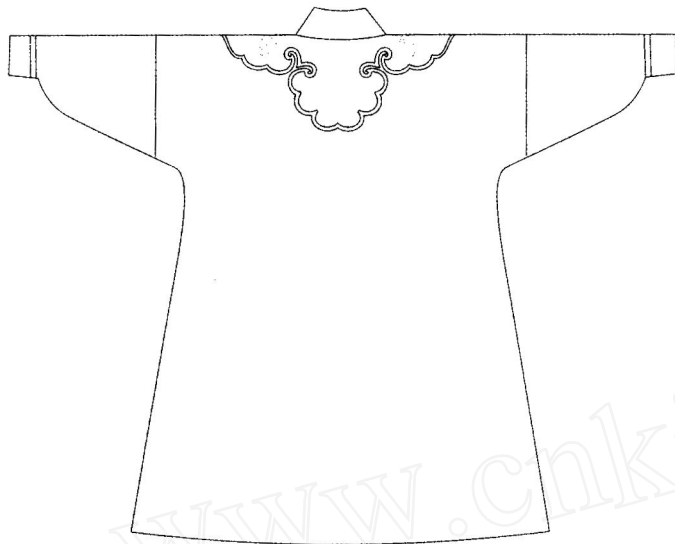
蒙元时期是中国龙袍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龙袍类型及其在龙袍形成历史上的地位作一探讨。元代丝织物虽然常用龙纹作为图案,但用一般的小龙或暗花龙进行装饰不能称为龙袍。本文所指的龙袍,是用较大的龙纹在袍服的显著部位进行装饰,明确地显示龙纹以作为其等级的象征。其袍服类型包括长袖和短袖的各种长至膝盖的外套,其中包括一般的窄身袍、腰线袍以及辫线袍、海青衣、短袖袍和大袖袍。根据龙纹的装饰类型不同,又可将蒙元龙袍分为三种类型:云肩式龙袍、胸背式龙袍和团窠式龙袍。

一 云肩式龙袍

云肩式龙袍是在环绕领子的区域内装饰龙纹。这种环绕领子的区域可以是圆形,但更

多是用云肩的形式。几乎所有的云肩式龙袍在环绕领部进行装饰时,同时又有一种带状纹样装饰肩袖和膝部,称为袖襕和膝襕,因此又被称为“云肩襕袖式”。这一名称见于《元典章》“至元十年某月某日袁州路申奉到江西行省割付坐到机张综线合用丝线料例”,其中提到熟机、花机和云肩襕袖机三种织机,以及这些织机所用的综线、衢线、直线、过线等各种线料的数量。这里的云肩襕袖机,应该就是专门用于生产以云肩、袖襕、膝襕为特征的妆花织物的织机^[3]。这种带有袖襕和膝襕的袍子在《朴通事·操马》中称为“通袖膝襕罗帖里”,其注云:“元时好着此衣(前后具胸背),又连肩而通袖之脊至袖口为纹,当膝周围亦为纹如栏干,然织成段匹为衣者有之,或皮或帛,用彩线周遭回曲为缘如花样,刺为草树、禽兽、山川、宫殿之纹于其内,备极奇巧。皆用团领着之,其直甚高。”^[4]

云肩的记载最早见于《金史·舆服志中》“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妇”条:“又禁私家用纯黄帐幕陈设,若曾经宣赐鸾舆服御,日月云肩龙文黄服、五个鞞眼之鞍皆须更改。”^[5]这里提到的日月云肩龙纹黄服,应该就是在云肩左右



图一 云肩盘龙大袖袍结构图

饰以日月、身上饰以龙纹的龙袍。而云肩的形状在《元史·舆服志》中曾有提及：“衬甲，制如云肩，青锦质，缘以白锦，衷以毡，裹以白绢。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6]这里明确地提出了云肩的形制是如四垂云，与元代青花瓷上的纹样非常相似。

根据龙的形式，元代的云肩式龙袍又可分为四盘龙和缠身大龙两类。其中缠身大龙一般均为两条龙，而四盘龙即是将四条盘龙分别置于四片垂云之中。

关于云肩四盘龙的形象，可在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暗花织金绫大袖袍中隐约看到。大袖袍是当时成年女性的专用款式，《蒙鞑备录》载：“有大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7]此袍为右衽交领，衣长163厘米，通袖宽206厘米。袍服肩部隐约可见云肩，云肩宽度约为94厘米，背后高约35厘米。其主体面料的地组织为2/1Z斜纹上起1/2Z斜纹暗花，暗花之上再织入片金。其中织金部分的图案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小圆点作地，另外就是云肩和膝襴。由于织金的脱落，其纹样已模糊不清，但依然可见四个垂云中分别有一条两角四爪的龙，因此可以称为云肩四盘龙纹。不过此袍在肩袖部位并无带襴装饰，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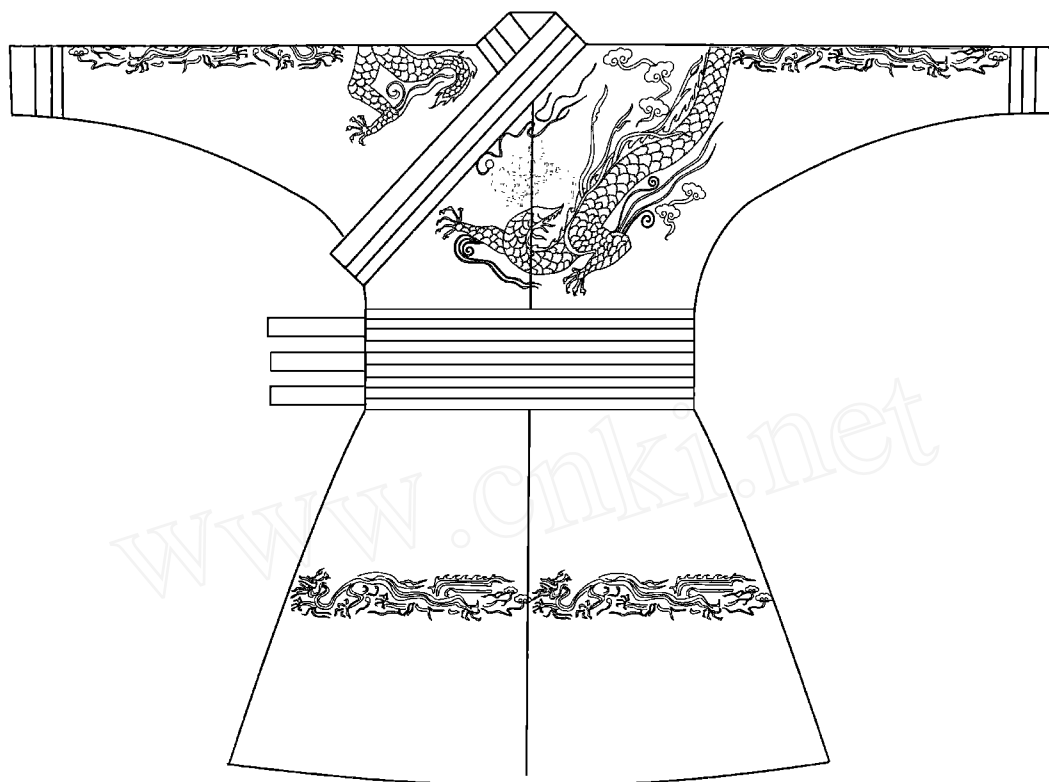
膝部有一条横襴，图案模糊，襴宽约12厘米^[8]，襴中推测应为行龙图案(图一)。

有关云肩四盘龙袍的图像并不多见，目前所知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1280年作)中，皇后彻伯尔所穿云肩四盘龙纹海青衣^[9]。海青衣的基本款式与当时普通的窄身袍并无大别，只是在袖子近臂处开有两口，以供手臂穿出。《心史》记载：“其衣于前臂肩间开缝，却于缝间出内两衣裳袖，然后虚出海青两袖，反支悬纽背缝间，俨如四臂。”^[10]此件海青衣以白色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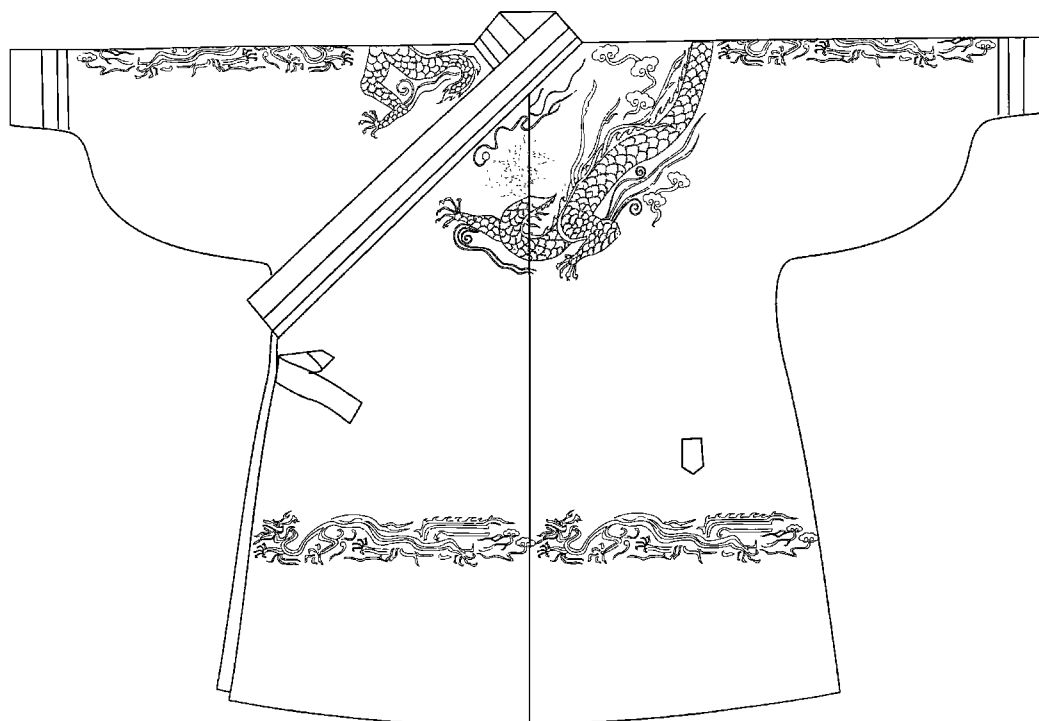
地，上面用灰色清晰地绘出云肩和袖膝襴纹样。其中位于胸前的一条盘龙纹基本清晰，龙身由上而下，龙首昂起，是从唐代至元代十分流行的盘龙样式。

相比之下，另一种类型的缠身式龙袍似乎更为重要。《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记载，大德元年(1297年)三月十二日，“中书省奏：街市卖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织着卖有。奏呵，暗都刺右丞相、道兴尚书两个钦奉圣旨：胸背龙儿的段子织呵，不碍事，教织者。似咱每穿的段子织缠身大龙的，完泽根底说了，随处遍行文书禁约，休教织者”^[11]。大德十一年(1307年)，又禁织五爪双角缠身龙、五爪双角云(肩)袖襴、五爪双角答子、五爪双角六花襴段匹等^[12]。元代关于缠身式龙袍的图像以四盘龙纹为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元世祖出猎图》和缂丝蔓荼罗上的元文宗、元明宗以及他们两位皇后的肖像，而最为清晰的是元上都羊群庙发现的元代石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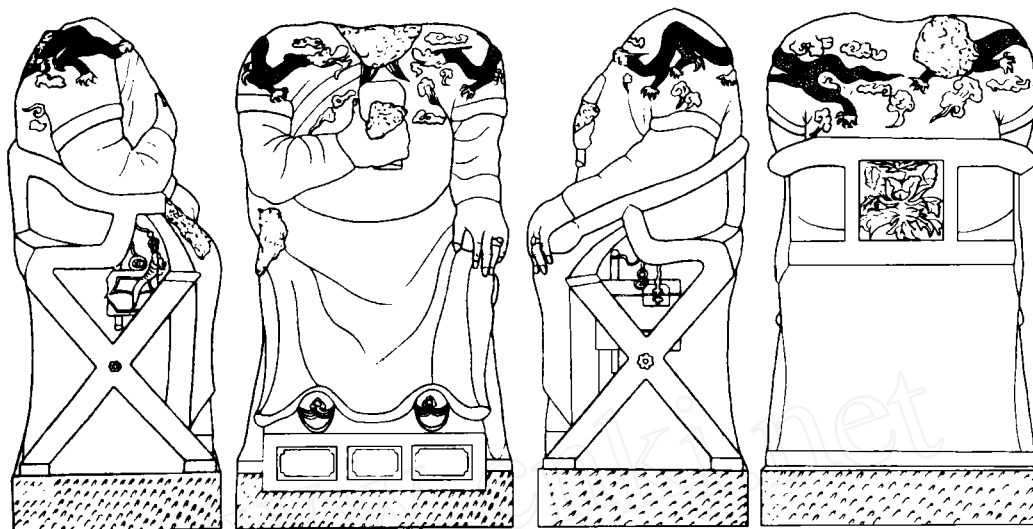
《元世祖出猎图》中的元世祖外穿银鼠白裘，内穿大红色袍，胸前可以看到金色缠身大龙的龙头，衣摆上可以看到以行龙构成的膝襴。从袍中间的腰线来看，这件窄身袍应为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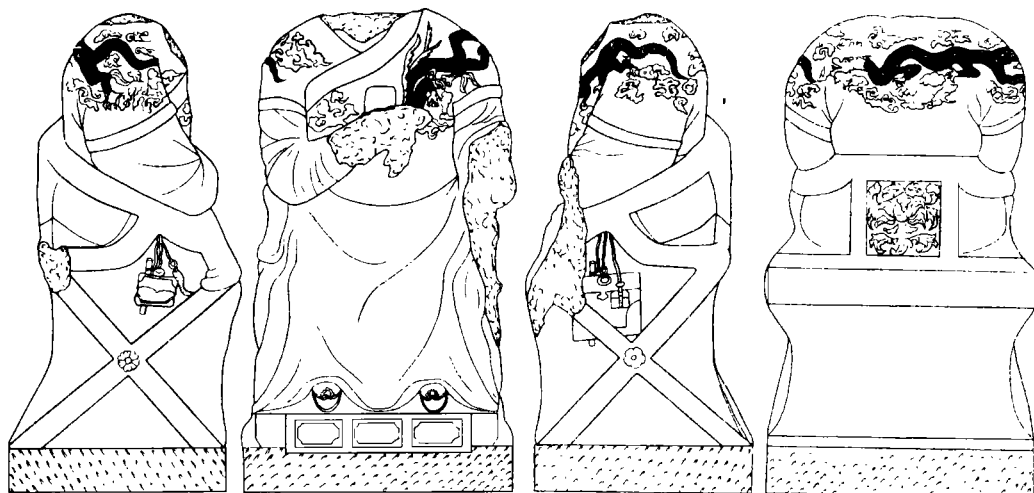
图二 缠身龙窄袖袍结构图



图三 缠身龙大袖袍结构图



图四 羊群庙一号石雕过肩对龙纹袍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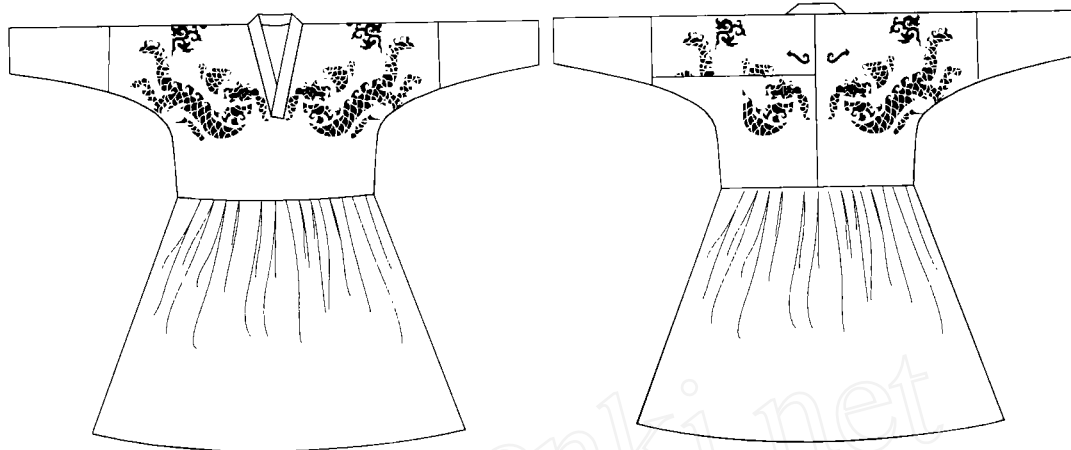


图五 羊群庙三号石雕缠身龙袍人像

线袍或者辫线袍(图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缙丝蔓荼罗左下角的元明宗和元文宗像,也都穿有深红色的缠身大龙袍,其缠身龙在两个袖身都露出了后足的一部分,从其间距来看,应该有两条首尾相接的五爪龙,两袖各有一条行龙作袖襕,而膝部只露出了极少量的膝襕(图三)。两位皇后穿的是完全一致的红色大袖袍,领袖之处均用织金锦纳石失制成,其缠身龙基本被挡住,只可看见一头一尾,很有可能还是首尾相接的两条龙。而用于袖襕和膝襕的行龙则十分清晰,应为两角五爪。袖部

应为一条行龙,膝部正面可能还有四条首尾相接的行龙^[13]。

此外,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羊群庙祭祀遗址发现的元代石雕上,也有短袖的缠身龙袍。该遗址共出土三件大型汉白玉石雕人像,其头像已缺,身坐交股双扶手圈椅之上,右手持杯。其中的一号和三号雕像均穿着双龙卷云纹袍。一号雕像残高 137 厘米,端坐于靠背圈椅之上,内穿窄袖贴里,外穿右衽短袖长袍(或称搭护),袍外装饰双龙纹和卷云纹图案,龙在身前作相向对称式分布,环绕至背部则为龙尾相对(图



图六 绢地妆花斗牛纹袍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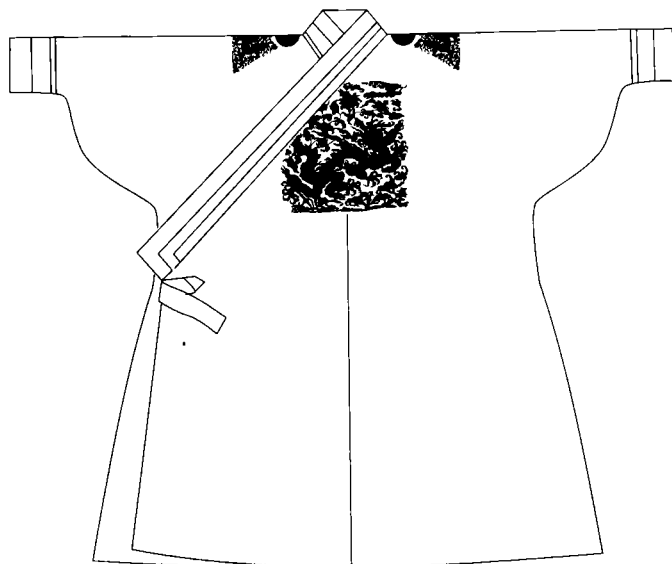
四)。三号遗址出土的雕像残高 155 厘米,袍服款式也相似,但右衽短袖长袍上的双龙纹有所不同,它们环绕胸背,首尾相连,龙身略作弯曲,鳞甲整齐细密,四至五爪^[14](图五)。据考证,该石雕的制作年代为 1314~1358 年之间^[15]。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首尾相接的两条缠身龙及单条的缠身龙袍实物,但两龙相对的龙袍实物却有类似的发现。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一件绢地妆花斗牛纹袍,袍长 142 厘米,通袖长 176 厘米,V 形领,窄袖,袍服右侧开衩。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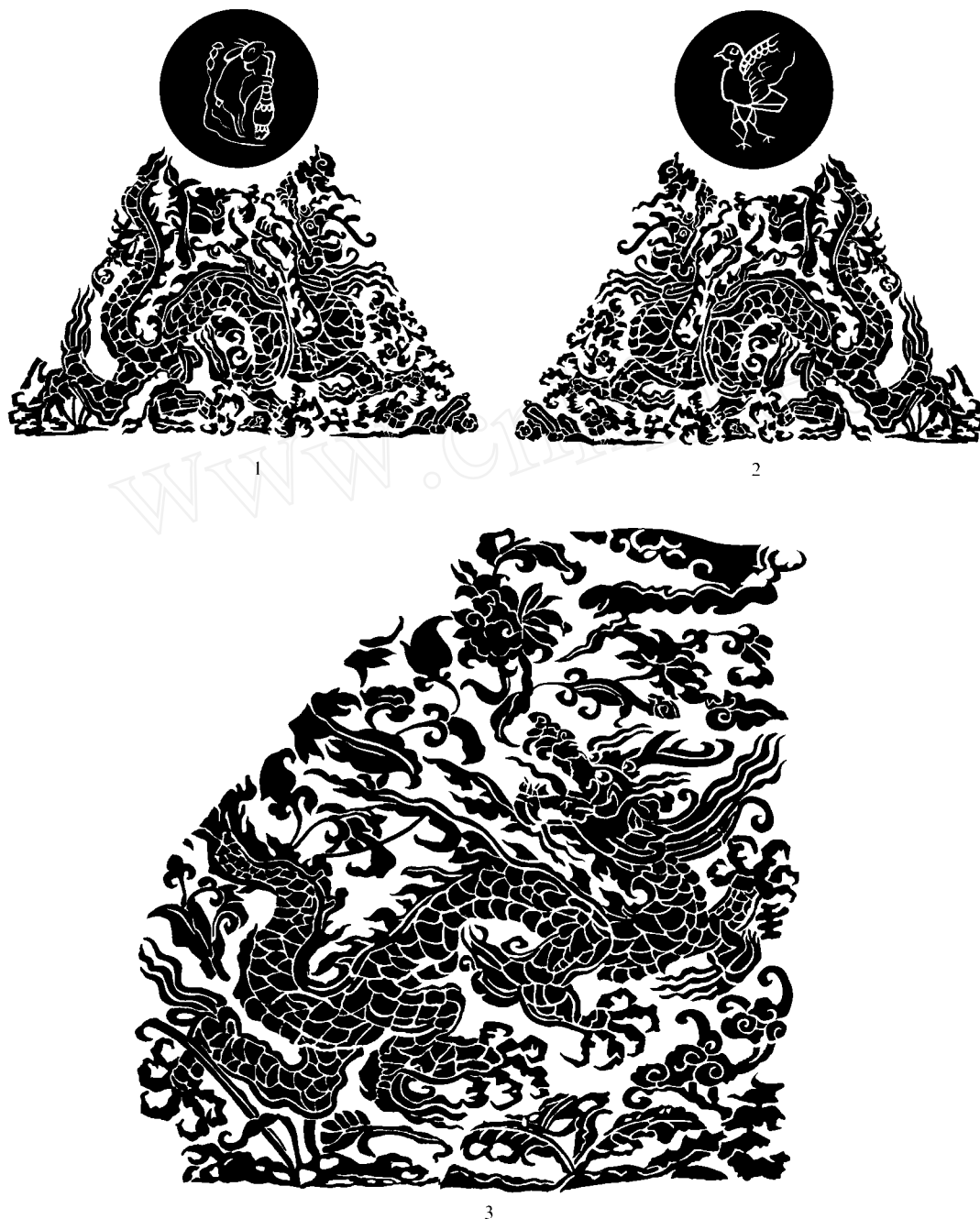
身面料以平纹地上妆花织出主纹,纹样长 105.5、宽 43 厘米,但较为模糊。总体作龙形,前后各有两龙相对,可见褐色龙身,但未见龙爪,白色牛角明显,因此暂称为“斗牛纹”。纹样周围原先应该有片金,现已脱落。在离下摆 31 厘米处还有一条宽为 18 厘米的膝襴,也应是妆花斗牛的图案^[16](图六)。

元代还有一种服装与袖襴和膝襴相关,即《元史·舆服志》中记载的“宝里”。当时的天子质孙冬之服中,有大红、桃红、紫蓝、绿色的宝里等,夏之服有大红珠宝里、白毛子金丝宝里。

百官质孙冬之服中虽无宝里,但夏之服中也有聚线宝里、大红官素带宝里、鸦青官素带宝里等。“宝里”下注:“宝里,服之有襴者也。”^[17]《元史·舆服志》还在“服色等第”中提到襴,“职官除龙凤文外,一品、二品服浑金花,三品服金答子,四品、五品服云袖带襴,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这里的袍服之襴有几种可能:一是中国传统的自唐代开始就已出现的襴,可能只是在袍服的某个部位加了一条线。二是只出现在从领口到肩部的一条横襴,宽约 15~20 厘米,通常以几何纹或花卉构成,是典型



图七 云龙纹胸背日月双肩大袖袍结构图



图八 云龙纹胸背日月双肩大袖袍上的图案
1、2. 肩饰图案 3. 胸背图案

的纳石失产品。在元代,大量的纳石失辫线袍和大袖袍都有这种装饰带。三是与云肩式袍服相配合的袖或膝。比较实物来看,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大,因此,也有人将《元世祖出猎

图》中元世祖所穿的大红袍称为“大红宝里辫线袄”或“大红宝里腰线帖里”^[18]。

其实,云肩式龙袍中还应该有一种云肩里外都布满龙的样式,其品种主要是缂丝。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和国外一些机构收藏有若干件带有云肩轮廓的缙丝残片,云肩内外都是各种形式的极为生动的龙纹^[19](图九、一〇)。这件缙丝原应是一件缙丝袍料,正如洪皓在《松漠纪闻》中所记载的当地回鹘人“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缙丝,甚华丽”。这样的袍服无疑是一件缙丝满地龙袍了。

二 胸背式龙袍

胸背指的是仅在胸前背后织出的一块方形图案,可看作是后世“补子”的前身。胸背式龙袍也就是指在胸前背后有方形的龙纹图案的袍服。

胸背式龙袍的最早记载见于前载《通制条格》卷九《服色》条:“胸背龙儿的段子织呵,不

碍事,教织者。”^[20]文中提及的胸背龙儿,无疑是制作胸背式龙袍的袍料。但此后一直没有再看到任何胸背龙纹的记载。

胸背式龙袍的实物所存不少。蒙元文化博物馆藏有一件水波地云龙纹织金胸背腰线袍,此袍通体以水波纹作地,2/1Z向斜纹地,1/2Z斜纹花,但在胸前背后织有方形的织金胸背,高25厘米,宽约30~33厘米,其中的图案应是龙纹,但十分不清楚。双肩上也有双龙托起一个圆盘,但是不见日月的纹样^[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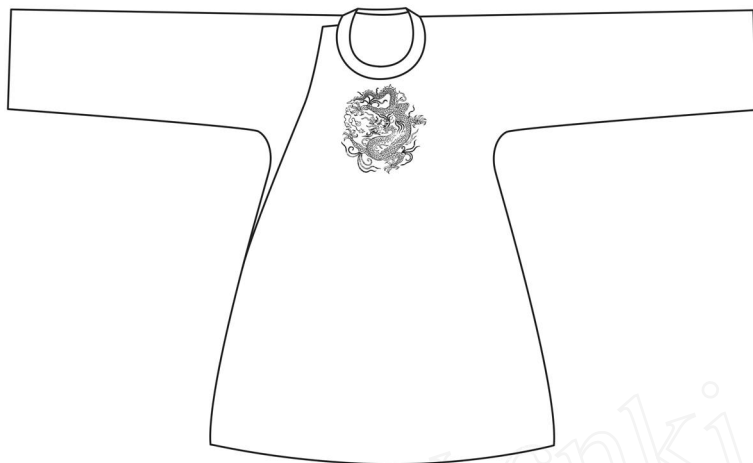
目前国外也有若干件元代胸背龙袍实物的收藏。在美国私人收藏中有一件云龙纹胸背日月双肩织金大袖袍,它以方格卍字纹绦作地,在衣料主体织入双奔兔纹的金搭子,而在胸前、背后都织有方形的龙纹胸背,胸背约高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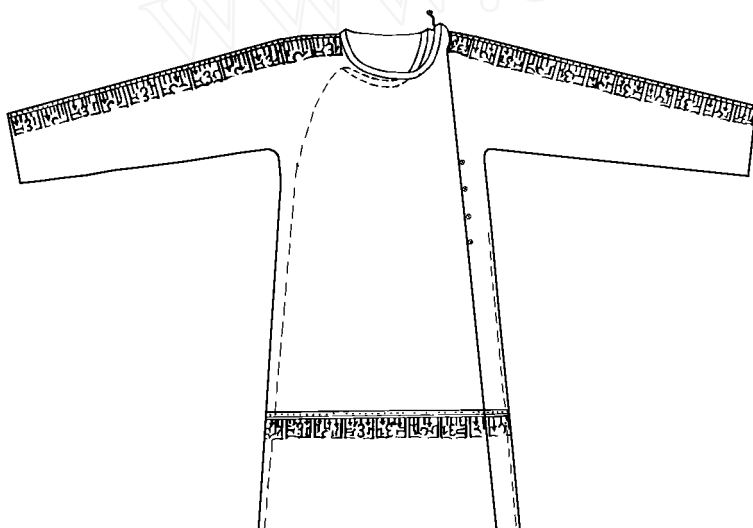
图九 缙丝云肩龙纹残片



图一〇 缙丝云肩龙纹残片



图一一 明玉珍墓出土的团窠式龙袍结构图



图一二 黑龙江阿城金墓出土的异样文锦袍结构图

厘米,宽 36 厘米(图七)。其左肩有云龙捧日,右肩有云龙捧月纹样,而且这两个圆盘中均可看到明确的兔纹和鸟纹,证明这是日月纹(图八)^[22]。

其实,描绘胸背式龙袍最为详细的图像资料也是《元世祖出猎图》。图中所绘上排左起第一人为射箭者,身穿绿色海青衣,内有大红贴里,左手持弓,手臂已从海青衣的左袖伸出,左袖挂在外面,右手引箭。海青衣的胸前有一方形图案,内为金色云龙纹样,当为织金胸背云龙。前排左侧第二人骑马擎鹰,穿蓝色窄袖袍,胸前可见有织金胸背,应该也是云龙纹样。这

件衣服与上件所不同的是,其双肩也有相应的云龙织金装饰,正与美国收藏的云龙纹胸背日月双肩织金大袖袍相似。

穿着胸背服装的人物形象还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缙丝蔓茶罗中的元文宗和元明宗像。元文宗外穿一件白色织金龙纹胸背短袖长袍,胸前为方形织金龙纹,肩上有三角形的肩饰,应该也是日、月和龙纹装饰。而元明宗身穿一件深蓝色的短袖长袍,胸前织有方形龙纹胸背^[23]。

三 团窠式龙袍

目前所知的团窠式龙袍实物仅见于元末明玉珍墓。明玉珍是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曾于 1363 年占领重庆为都,建立大夏政权,统治四川及其邻近地区。明玉珍死于 1366 年,其墓于 1982 年被发掘。据报道,除一件淡黄水龙纹缎褶衣为暗花纹的

水波龙纹暗花织物外,其余五件均可称为团龙纹龙袍。一件是青缎龙袍(84005),出土时覆于棺盖,经修复后测得袍长 137 厘米,通袖长 202 厘米。圆领,右衽,胸前背后用黄丝线各绣一龙,团龙直径为 47 厘米。丹黄素缎龙袍有两件(84001、84006),出自棺内。其中一件较完整,衣长 137 厘米,通袖长 226 厘米,款式与上相同,胸背各用黄色丝线各绣一龙,图案直径 46 厘米。另一件破损严重。赤黄素缎龙袍两件(84002、84003),出于棺内,尺寸相同,衣长 132 厘米,通袖长 244 厘米,胸背也各用黄丝线绣出团龙,直径 46 厘米^[24](图一一)。事实上,这些黄

丝线不应是当时的色彩,而是在埋葬几百年后褪色形成的。

团龙又可称盘龙,团龙袍在元代史料中所见不多。《元史·舆服二》中仅见一例:“殿中导从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左右。引香铎案一,黄销金盘龙衣,金炉合,结绶,龙头竿。”^[25]这里的销金盘龙衣应该就是一种团龙纹的印金袍服。虽然这件团龙服只是仪仗人员所用,并非皇帝贵族或是百官大臣所用,但这种团龙袍服依然有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元代使用团窠图案的情况依然较为普遍。《元史·舆服一》“百官公服”载:“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一品紫,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无文。”^[26]这里的大独科花用的就是团窠的形式。山西洪赵县广胜寺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所表现的元代杂剧人物中,也有两人身穿团窠纹长袍。这说明,起码在汉人地区,团窠袍依然十分流行^[27]。而《元史·舆服志》提到皇帝质孙服中的夏之服,有大红金绣龙罗、绿金绣龙罗、蓝金绣龙罗、银褐金绣龙罗、枣褐金绣龙罗和金龙青罗,由于目前所知云肩窠和胸背大多采用织金的方法,所以,刺绣的龙纹很可能就是团龙袍。

四 蒙元龙袍的来历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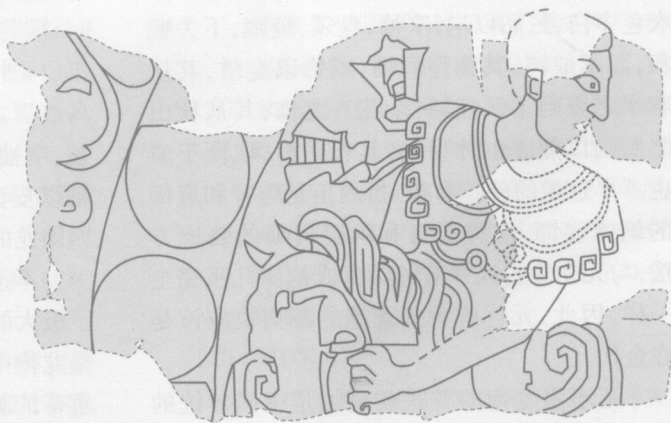
蒙元龙袍的三种主要类型各有来历,并对明清两代龙袍的形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云肩式和胸背式两种类型基本为蒙元统治者所乐用,并不在乎其所用的服装款式。我们所见的款式有辫线袍或腰线袍,有海青衣,有大袖袍,也有短袖长袍(搭护)。但云肩式龙袍的规格显然要比胸背式龙袍更高些。在《元世祖出猎图》中,共有人物十人,均为世祖近臣。其中三人服用云肩式袍服,分别为元世祖忽必烈、皇

后彻伯尔及前(此袍中的云肩无法确定是否为龙袍);四人服用胸背式袍服,地位明显低于前者;还有一人只有肩饰,二人素袍。

云肩的来历或与西方有关,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云肩装饰源自西域。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 77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唐代的联珠骑士纹锦中的骑士,就在其领部披了一件云肩。此人深目高鼻,明显是西域胡人的形象^[28](图一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保存着一件雕塑,属于 10~11 世纪的伊朗作品,身上也披着明显的云肩^[29]。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有一幅《涅槃图》,佛身边有各地前来吊唁的人物,其中也有披着云肩的人物,年代约在 10 世纪^[30]。不过,所有这些云肩应是制成云肩形式的披件,有如清代朝服上的披领。而中国最早关于云肩的记载是在金代,称为“日月云肩龙纹黄衣”^[31],这里的日月云肩最有可能是织在袍服上的。至于袖襕和膝襕的装饰,国内最早见于黑龙江阿城金墓的异样文锦袍,为左衽圆领,袍上从肩至衣臂袖以及下摆部位各有一条织金襕,襕上的图案如阿拉伯库非体,不可识读^[32](图一二)。这类带状纹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中也有类似的描绘。这件织物虽然出自国内,但其纹样的来历或恐还在西方。

金元时期的加金织物,从技术角度而言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单插合的地络类织物,即在



图一三 联珠骑士纹锦中披着云肩的波斯人像

一个基本组织地上插入片金织出图案,片金线依靠地经固结。这类组织自唐出现以来,盛行于辽,在金代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这类组织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加金织物,虽然也可以称作织金锦,但更合适的称呼是织金绦或织金绢,在当时的史料中称为“金段子”或“金搭子”等。二是双插合的特结锦(lampas),即利用一组专门的固结经来固定插入的各种金线,金线可以是捻金,也可以是片金。这种织金锦所用的纤维、组织、门幅和图案等,都与上述中国特点的加金织物不同,我以为这才是当时所称的“纳石失”,具有明显的西方织锦特点^[33]。目前所见的纳石失织金锦虽然也经常出现在织物中出现一条襴状纹样,但它只是通幅图案,在服装上仅出现在背后的上部和肩部,并不是妆花。而前一类地络类金段子则经常采用妆花的方法织出较大的图案,可以织出如云肩和袖襴、膝襴等特殊部位的纹样。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所有的云肩和袖襴、膝襴都是在中国织工的技术体系中生产出来的。所以,虽然云肩的形制来自西方,但中国人将其织入了织物,使其成为一种妆花织成产品。虽然库菲字体的带状图案来自西方,但金代的织金襴却与西方的完全不同。换言之,元代的云肩式龙袍形式来自金代,而不是西方。

同样的情况在胸背式龙袍上也存在。关于胸背的来历,我同样以为是以本土为主,特别是金人对它的影响^[34]。《金史·舆服志》载:“其衣色多白,三品以皂,窄袖,盘领,缝腋,下为襞积,而不缺袴。其胸臆肩袖,或饰以金绣,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鹞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氍,取便于骑也。”^[35]这里的胸臆肩袖,指的正是胸背和肩部的织绣装饰,这种服饰和胸臆肩袖的装饰方法,与元初蒙古人穿着的胸背式袍服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元代胸背式龙袍的源头也应该是在金代。

至于团龙袍的款式就更加是中国传统的了。史载隋文帝以赭黄纹绦袍听朝,唐高祖以

赭黄袍巾带为常服,后来天子用赤黄色袍,民间就禁用黄袍。辽代继承了这一传统,这种赭黄袍是当时皇帝穿着最为经常的服装,其上应该会绣有团龙。目前所知最早的团龙袍是辽代的黄罗地蹙金绣团龙袍,全身胸前背后上下各有两个大团龙,肩上、袖口也各有一个小团龙,共11团龙^[36]。宋代天子所服的绛纱袍,正是以织成云龙红金条纱为之^[37],可能也是团龙形式。类似的图案在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无款南宋画《孝经图》中《事君章第十七》所绘皇帝形象中可以看到^[38]。此外,宋代的天子册匣也以云龙纹装饰,涂以朱漆,金缕百花凸起行龙,同时还覆以红罗绣盘龙蹙金靶^[39]。金亡之后,京湖制置司以所获亡金人宝物来献,其中有完颜阿骨打传下来的宝物——销金盘龙红绦丝袍^[40],应该就是阿骨打穿过的龙袍。这件龙袍虽然是用销金(印金方法之一)的方法做在红色的绦丝织物上,但其图案的形式为盘龙,应与当时流行的团龙服是一致的。此外,敦煌壁画中有回鹘王的形象,身上穿的也是团窠式的龙袍^[41]。

可能是因为团窠式龙袍已为大江南北各朝所用,元代统治者并不欣赏它,所以,团龙袍在元代也只是在较次要的层次上使用。相反的是,元末各路农民起义军却以辽宋时期的团龙袍为正宗,在自命为王时,总是用团龙袍作为自己正式的服装,将其作为号召。这不仅仅是明玉珍,而且还有朱元璋。朱元璋在明代定制时,就将团龙袍作为龙袍定式之一,到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将其定得更为具体:“冠以乌纱帽之,折角向上,其后名翼善冠。袍黄,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带用玉,靴以皮为之。”^[42]这里的黄色织金盘龙袍就是四团龙的龙袍。

不过,这三种形式的龙袍仍然对明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皇权回归汉族,团龙袍无疑应该是龙袍中最为正宗的形式,这从明代早期各位皇帝的画像中就可以看出。传明太祖朱元璋坐像中,可以看到他所穿的是四团龙常服袍^[43];另

一幅明太祖像也是穿四团龙常服袍^[44]。永乐和宣德等各位皇帝的肖像均穿团龙袍,到后来各位皇帝则是穿袞服入画。山东邹城明初朱檀墓中共出土龙袍四件,其中三件是四团龙袍,一件是四盘龙云肩袖^[45]袍。云肩袖^[45]龙袍在元代曾是最显赫的服装,到明代后已不再作为最高等级的服装,但其款式仍在宫中流行,皇帝有时也穿此类服装,特别是宫内人员,也可经常穿着此类款式,但不一定是龙纹。而胸背式龙袍,在元代也不是作为最高服装出现的,到明代后索性成为百官服装的款式,最后形成了补服。在不少描绘明代宫廷生活的绘画中也有反映,如商喜的《明宣宗行乐图》、明人《出警图》和《入跸图》中就出现有大量穿有这类袍服的侍从^[45]。

本文承魏坚教授提供羊群庙照片资料,刘珂艳和万芳绘制线描图,特致谢意。

- [1] 黄能馥《龙袍探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
- [2] Zhao Feng, *Style from the Steppes: silk costumes and textiles from the Liao and Yuan periods, 10th to 13th century*, Rossi and Rossi, London, pp. 16 - 19, 2004; *Three major types of imperial dragon costume*, forthcoming to b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Oriental Ceramics, Hong Kong.
- [3] 《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
- [4] 《朴通事谚解》,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第227页,中华书局,2005年。
- [5] 《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中》。
- [6]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 [7] 孟珙《蒙鞑备录》,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蒙古史料四种》,正中书局印行,1926年。
- [8] 赵丰、金琳主编《黄金丝绸青花瓷》,第60、61页,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2005年。
- [9] 石守谦、葛婉章主编《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第26、27页,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简松村《弓劲马强大漠射猎——元世祖出猎图》,《故宫文物月刊》,1989年第10期。本文所用《元世祖出猎图》的图片均来自以上两处。
- [10] 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郑思肖集》。转引自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第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11] 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34页,1986年。
- [12] 同[3]。
- [13] 赵丰《织绣珍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第273页,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1999年。
- [1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蓝旗文物管理所《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及墓葬》,李逸友、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集)》,第610~6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15] 魏坚、陈永志《正蓝旗羊群庙石雕研究》,李逸友、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集)》,第622~62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16] 同[8],第56、57页。
- [17]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
- [18] 崔圭顺《元世祖出猎图》所绘世祖服装考,见赵丰、尚刚主编《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第196~209页,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2005年。
- [19] James Watt and Ann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7, p. 75.
- [20] 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第13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同样的文字在《大元典章》中有漏字,作“奏呵,暗都刺右丞、道尚书两个钦奉圣旨:背龙儿的段子织呵,不碍事,教织着。”见《大元典章》卷二九礼部卷二《服色》条。
- [21] 楼淑琦《介绍三件元代袍服的工艺及其修复》,赵丰、尚刚主编《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第259~264页,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2005年。
- [22] 赵丰《蒙元胸背及其源流》,赵丰、尚刚主编《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第143~158页,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2005年。
- [23] 同[13]。
- [24]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重庆明玉珍墓》,《考古》1986年第9期;重庆市博物馆《明玉珍及其墓葬

- 研究》,第4~35页,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
- [25] 《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
- [26]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 [27] 图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图156,台湾南天书局,1988年。
-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国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33,文物出版社,1973年。
- [29]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伊斯兰展厅展出。
- [30] 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编《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壁画艺术》,第56、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 [31] 《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中》。
- [32] 赵评春等《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图30~38,文物出版社,1998年。
- [33] 赵丰《中国丝绸通史》,第353~355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 [34] 同[22]。
- [35] 《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
- [36] 赵丰《辽代丝绸》,第199页,沐文堂(香港),2004年。
- [37]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 [38] 《中国绘画全集·五代辽宋金之四》,第101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99年。
- [39] 同[37]。
- [40] 《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
- [41] 此图引用甚多,见常沙娜《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第261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
- [42] 《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皇帝冠服·常服”条。
- [43] 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引自 Patricia Berger, A *Stitch in Time: Speculations on the Origin of Needlelooping*, *Oriental Arts*, August 1989, fig. 8.
- [44] 高山泽《中国历代帝后像》,有正书局。
- [45] 《明宣宗行乐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明人《出警图》和《入跸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 (责任编辑:郑 彤)

(上接第68页)

- [39] 殷涤非《安徽寿县新发现的铜牛》,《文物》1959年第4期。
- [40] 涂书田《安徽寿县出土一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寿县博物馆《安徽寿县再次出土大量楚国郢爰》,《文物》1992年第10期。
- [41] 李景聃《寿县楚墓调查报告》,《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1936年8月。
- [42] 张钟云《楚都寿春城的探索》,《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年。
- [43] 丁邦钧《楚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丁邦钧、李德文《寿春城遗址遥感调查的新收获》,《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44] 丁邦钧《寿春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 [45] 孙华《楚国国都地望三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 [46] 孙华、曹大志《寿县楚故城考古的回顾与展望》,《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年。
- (责任编辑:王 霞)